

# 论传统儒家思想的当代转化进路

## ——“时代化、科学化与生活化”命题探析

陈宗章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价值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面向现代性的现实境域,传统儒家思想只有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才能进一步体现出历史和时代价值。实现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化”即把它的理论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结合起来,回答时代的新课题、新任务,以满足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科学化”即实现传统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等现代性理念的对接,从而祛除自身理论体系中的封建性糟粕,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生活化”即把传统儒家思想融入现代人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中来,关注每个人的个体价值,为现代人确立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关键词:**传统儒家思想;当代转化;时代化;科学化;生活化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5)01-0032-04

传统儒家思想是在小农经济、专制政治和宗法血缘制度构成的社会结构中孕育和生长的,是历史和社会实践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它有多种存在状态,学界一般从“原典儒家”、“皇权儒家”和“民间儒家”3个层面上展开论说。本文所议“传统儒家”主要在第一个层面上使用。传统儒家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发挥着重要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意识形态引导功能以及精神文化传承功能。而价值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针对现代性的现实境域,传统儒家思想只有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才能进一步体现出历史和时代的价值。笔者尝试提出推进传统儒家思想“时代化、科学化与生活化”的重大命题,使之积极反映并适应当代意义的“社会存在”。

### 一、“时代化”:传统儒家思想与时代发展同进步

应对现代性对传统的解构,反映并适应时代的新变化。事实上,现代性已悄然成为反叛乃至审判“传统”的代名词,实现传统儒家思想当代转化之“时代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它与现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有人以断裂式的思维对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

关系,无视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从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又有人过分夸大传统文化价值的普世性,无视社会意识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抹煞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从而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些形而上学式的思维方式实质上都是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僵化、片面认识。历史唯物主义表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一种思想或理论不仅是对现实的简单摹写,而且是在观念层面的深度建构。判断一种文化理论是否先进,也不仅仅在于时代和地域,根本上在于其本身是否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传统儒家思想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照察已经深入人类文化和精神发展的最深层面,深刻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某种意义上,它所具有的普世性价值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杜维明曾明确指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作病理学的解析,总是拷问为什么它该死不死?该消失而不消失?而是还应该做生理学的考究,那就是它为什么这么长寿,为什么富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和兼容并包的气魄?<sup>[1]</sup>对于传统儒家思想而言,我们不能因为它来自遥远的“传统”,就断定它成了“旧事物”。与此同时,我们亦不能无视历史

收稿日期:2013-09-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规划基金项目(10YJA71005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Q028)  
作者简介:陈宗章(1979—),男,山东临沂人,讲师,博士,从事儒家哲学研究。

条件的新变化而对之全盘肯定。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儒家思想作为活在历史中的意识形态,面对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的浪潮,应积极调整自身的姿态,反映时代的新变化,体现时代的新要求,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善和发展自我。

坚持文化自觉的理念,接续传统儒家思想的“道统”精神。文化自觉是人们在文化建构、文化选择和文化评价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主体精神,它集中反映了人们对自身文化及其命运的理性认知与把握。换言之,文化自觉实质上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认知状态,由此否定了盲目的、情绪化的、片面的乃至脱离社会实践的非理性文化认知状态,从而支撑起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健康发展<sup>[2]</sup>。基于此,实现传统儒家思想当代转化之“时代化”,务必秉持文化自觉的精神,接续和发扬其内在的“道统”精神。“道”是一种逻辑的表达,是一种以仁义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建构;而“统”是一种历史的表达,代表一种传承的历史意识,从而体现出传统儒学的历时性发展。具体来说,传统儒家思想集中在道德领域,旨在升华人性,培育圣人品格;呈现于政治领域,也是为了达成“为政以德”的理想目标,力图以道德转化政治,从而最终使“人”成为“人”的存在,使社会成为“人”的社会。而这一切都建基于人性的训练和养成,以完成自我在内在精神上的升华和超越。坚持文化自觉的理念,接续传统儒家思想的道统精神,推进其“时代化”进程,就是要把它的理论及其内在精神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结合起来,使之回答时代的新课题、新任务,满足现时代“此时此地的需要”。这是传统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入世”精神之理论品格的体现,是为现实服务的与时俱进之精神的体现。弘扬传统儒家思想的“道统”精神,对于重构现代人的心性结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精神共同体,对于充实和完善中华民族精神,在内容和路径等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建立民族文化认同感,主动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当代社会,伴随全球化浪潮的来临,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水平和发达的传播媒介,向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力图以强势姿态把握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对于传统儒学而言,这种挑战带来的冲击力“所否定的不只是表层结构的儒学学说,不只是那些伦常政教体制,而更是积淀在深层结构中以‘儒’为主的‘一个世界’观的华夏传统……这是对中国‘民族性’、‘国民性’的挑战。”<sup>[3]</sup>另一方面,由于对民族历史和传统

文化的片面性反思,加之受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民族文化上的认同危机。由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关系不仅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威胁,还受到个体文化心理及判断力的考验。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下,推进传统儒家思想当代转化之“时代化”步伐,必定要以建立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为基本前提,并能够从民族文化的视角积极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sup>①</sup>要在思想观念上对历史虚无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等片面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算。事实上,关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说到底就是对于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全球化的丰富性正是源于本土文化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如果试图以“全球化”否定“民族化”,以“时代精神”否定“民族精神”,其实质便是否定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同时,我们还要澄清民族文化中的不足乃至糟粕,借鉴西方文化中关于科学、理性、公正、自由等理念中的合理成分,从而打破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sup>②</sup>要通过中西文化之间的积极对话,使民族传统文化吸纳新的文明元素。杜维明指出,世界的不同文明应该展开积极的对话,通过对话进行自我反思、了解对方,这是一个互相参照、互相学习的过程,以致达成真正的文化上的平等互惠<sup>[4]</sup>。而这种对话机制,一是要求以文化自觉的精神不断创新传统儒家文化;二是要求秉承“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精神,把民族文化放置在世界文化的平台上展开相互间的真诚对话与沟通,把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和交流真正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只有如此,才能在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基础上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

## 二、“科学化”: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性理念相对接

秉持文化自觉的精神,需要以自我反省的态度对待传统儒家思想。一种文化只有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才能体现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内在精神,才能获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一种文化也只有通过文化自省才能不断发掘自身独特的价值,从而积极适应变化的社会结构和条件,建构起适应现代生活的普遍性意义框架。而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正是传统儒学的内在品质。历史上看,传统儒家思想曾发挥出巨大的历史价值,但是出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其理论体系最终没有发展出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性理念。由此,推进传统儒家思想当代转化之“科学化”的命题便应运而生。所谓“科学化”就是实现传统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等现代性理念之间的

对接,就是祛除自身理论体系中的封建性糟粕,以现代性理念来转化传统儒学。

事实上,推进传统儒学的“科学化”进程这一课题,早已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但对于传统儒学能否发展出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理念的期许,不同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答案。对此,新儒家坚持肯定的态度,并提出了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力主“返本”以“开新”。从熊十力的“断染成净”之理论构思,梁漱溟的“老根新芽”说,到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之设计和徐复观的“相互充实”说等均对此论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总体来说,新儒家均承认民主科学的正当性与基本价值,但又不妄自菲薄,而是带着文化反省的精神,一方面深刻认知传统儒学的“短板”,另一方面,坚持传统儒学的心性本体,沿着“内圣外王”的传统路径,力主在其内部开出民主科学来。当然,学界一些研究者也提出了相反的主张,认为从传统儒学中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出现代性理念。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多以为传统儒家文化根本上是一种专制主义文化,非但不能开出民主政治来,正是推进中国民主化建设的主要障碍。该类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力主将传统儒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可见,传统儒学的“科学化”之路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命题,它既关涉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化、时代化问题,又关涉到理论自身的存续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认知地位与实际功效问题。然而,我们能对传统儒家思想和现代性理念之间作简单的对立式的理解吗?实际上,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会通性。①传统儒家所建构的仁学体系,把“爱人”视为仁的本质体现,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实际上便是把人当作人本身来对待和尊重的。它虽然建基于等级制度之上,但不无体现尊重“个人”的意蕴,彰显出宽容、厚爱、责任的公共性精神。②传统儒家思想牢固地建立的人性论基础之上,承认人性天生的平等性,相信每一个人通过后天的教化都有自我实现的可能,都能够在道德人格上“成人成圣”。这种“人皆可为尧舜”的理论预设,自然是对人性之同等性、人之内在价值的充分肯定。③传统儒家所阐发的民本思想,虽然缺乏“民主”、“民治”的现代观念,但总体上却包括了“民有”和“民享”的理念,由此阐发出富民、爱民、恤民等民本思想,并作出具体的可操作性设计。另外,传统儒家虽然主张君权至上,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论说,又把天威还原于“民意”之中。这些都表明传统儒家所倡民本观念与民主思想虽有根本区别却又有紧密联系。④在政治目标

上,传统儒家虽主张“德治”,但并不完全否定“法治”,而是着力于“德主刑辅”、“明德慎刑”的设计。在其看来,国家首先是一种体现大爱的“道德”力量,政治的重心应放置于“仁民爱物”之上。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也没有过时,只是在一定意义上排斥了“法治”精神的发育。但传统儒家又把“德”与“礼”相结合,以“礼治”代替“法治”以确保道德之“软力量”的发力。依现代观点来看,传统儒家所倡的“礼”的精神已经内涵了对道德规范的制度化问题,并非纯粹是在“道德修养”上做文章,而摒弃了所有的制度性考量,诸如此类。

既然传统儒家思想中蕴含了朴素的民主、科学、法制等理念的“种子”,为何没有发展出近现代意义的民主、科学和法制等理念来呢?这里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原因。首先,传统儒家思想中虽有“民本”的思想,但缺乏“民治”的理念,更无民主的制度支撑。它所言说的“民”是作为被教化、被治理的客体而存在的,并无主体之政治地位。而在封建专制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被包裹在等级性的道德伦理关系之中,根本就无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实际存在状态而言;其次,传统儒家思想注重的是个体的生命与德性,讲究的是道德实践,力图通过“践仁体道”来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它在根本上是一种生命之学,其意并非在于征服自然。而西方人的二元对立思维则把自然当作人之外的客观对象来看待,并以对待自然的方法对待人事,注重形式逻辑、抽象思辨。科技成就辉煌灿烂的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近代自然科学精神,虽然原因复杂,但与儒学的这一文化特质不无关系;最后,在传统中国社会,儒家所倡“礼制”代替了“法制”的作用,礼乐教化的权威与政治的权威是同构的,“政教”合一便成为传统教化的基本范式。而道德“内修”的工夫强调的是内在的道德自觉而非外在强制性的“依法而行”。于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便出现了“有治人而无治法”的结果,自然就忽略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制问题。

总体来说,传统儒家思想没有发展出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理念,根本上是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同时,政治化儒家的运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传统儒家所开创的儒学真精神。但无论如何,传统儒家思想虽无开出民主政治之实,但潜藏着发育现代性民主的种子,至少它绝对不是反民主、反自由、反科学的一套理论构思,这就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科学化”转进提供了先机。陈来指出:“对任何一个传统来说,都会有些东西是其本来没有而将来也难以接纳的;同时也都会有些东西是其本来所没有

而后来或将来可以接纳的。因而‘本无’并不就排斥‘后有’。”<sup>[5]</sup>由此,当传统儒家思想与旧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彻底剥离之后,经过现代性的阐释和创造性转换,自然也可以嵌入现代民主政治的新观念、新思想,并得以不断发育。

### 三、“生活化”: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生活相契合

融入现代人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中去。徐复观指出,“知识,起于对客观事物的了解;道德,起于对自身生活的反省。两者都是由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来。”<sup>[6]</sup>由此观之,实现传统儒家思想的当代转化,还需要把它与现代人的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融合起来。一方面,交往实践是人的生活、生存方式。马克思在其社会交往理论中以人之“关系性”的本体出发,深刻阐明了交往实践的“交互性”特征,明确指出人只有在交往中才能真正获取其实践性本质,从而成为现实的主体。同时,由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7]</sup>,因而人只有在交往实践的普遍联系中,才能从动物性的生存状态下超越出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是一切思想产生和发挥作用的逻辑起点。生活世界是一种奠基性的原初境域,指向人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原本的、初始的世界,是人的经验世界。生活世界在根本上是在人的交往实践中生成的,是人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的产物<sup>[8]</sup>。有学者则进一步把生活世界区分为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前者旨在维持个体的生存和再生产,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而后者旨在维持社会的再生产,是一个自觉的充满创造性的活动领域<sup>[9]</sup>。笔者以为,在传统儒家思想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上,首先,生活实践是推进传统儒学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正是在生活的交往实践中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其次,传统儒学的理论实践从属于非日常生活世界,同时又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由此,实现传统儒家思想的“生活化”,应使得自身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实践中去,即把自身建立在现代人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上,从而把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有机地结合起来。

尊重日常生活状态中每一个“人”的个体价值。实现传统儒家思想当代转化之“生活化”的第二层意思就是:在全面理解现代人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意义,尊重每个人的个体价值。因为,处于现代生活状态中的“人”都是平等的,他们的彼此交往构成了全幅生活世界的生动

图景。而人的交往方式与生活世界本身又是一个动态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它在现代社会越发呈现出交往主体个性化、交往方式间接化等特点。由此,实现传统儒家思想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就是要立足于现实语境,努力实现其与生活世界的一种“合拍性”。而在交往实践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合拍性”即是一个彼此呼应、共同成长的过程<sup>[10]</sup>,其核心则表现为对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关注。刘小枫曾指出,个体的生成是现代性的标志<sup>[11]</sup>,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格。就此而言,传统儒家思想不仅要摒弃其理论中所蕴含的“等级性”,也不宜把“人”成长的全部过程仅仅聚焦于“德性”的生长,而是要把人还原于生活,更加完整地理解他,进而实现从“圣贤人格”向“现代人格”的转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层面的生活化,就是要突破对个体“私人”品性的关注,转而把“人”放置于更加宽阔的社会公共性领域中来。这种理念的转变,更能够把人当做真正的目的,而不是维护某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康德指出:“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sup>[12]</sup>一言以蔽之,传统儒家思想的“生活化”意味着把“现代的人”及其生活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视野之中。

为现代人确立生活的方向与意义。在主张传统儒家思想积极融入现代生活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性的极端式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现象,由此人们的道德生活也被殖民化。一是表现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技术化,即有用价值作为一种普遍性价值导向主导了人们的生活,道德所内含的实质内容和发挥的价值导向作用对于现实生活的支撑意义已经明显下降;二是表现为现代人生活状态的碎片化,他们立足于碎片化的生活片段之上,基于不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模式来思考和体验生活。由此,道德冲突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可见,现代人的生活已经不再是连续的统一体,个体的道德生活亦异化为断裂式的存在物。当道德教化遭遇现代性的极端发展,其普遍性意义即被搁置,个体也开始陷入孤立的境地。吉登斯说:“‘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sup>[13]</sup>我们以为,人之德性的存在才是道德的真正源泉。由此,推进传统儒家思想的当代转化,重新理解和肯定“德性”对于人之存在的根本规定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下转第65页)